

Y707/18a

邯郸文史资料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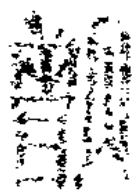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暨邯郸解放四十周年、邯郸起义四十周年专辑）

赠

邯郸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邯郸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邯郸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邯郸 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内部发行）

河北省邯郸市文具印刷厂印刷

目 录

芦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韩立才 (1)
日本侵略者在邯郸·····	郭连庆 (16)
百家村惨案·····	赵诚存、周连贵、张文涛 (22)
和村万人坑·····	陈光唐 (30)
关于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的回忆·····	张维翰 (35)
范子侠将军与平汉抗日游击纵队·····	尚荣生 (66)
抗战初期的河北民军第十三游击支队·····	金建国 (89)
西王看人民的抗日斗争·····	陈光唐 (106)
盟国飞机轰炸日军洛河大铁桥·····	杨允谦 (126)
记王天祥司令的一生·····	王气清、李大放 (130)
东亚同盟自治军始末·····	申秉正 (141)
高树勋将军处决汉奸石友三·····	高金荣 (155)
为邯郸起义出过力的爱国老人田烈茂 ·····	孔祥琪、朱锡杰 (170)
邯郸古城红旗飘 ——纪念邯郸解放四十周年·····	尚荣生 (175)
永年解放纪实·····	杨允谦 (203)

芦沟桥事变前后亲历记

韩 立 才

“芦沟桥事变”前，我在冀察绥靖公署任职，事变发生前后我正在北平，现将“芦沟桥事变”前后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抗战前夕的北平

日寇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层出不穷，华北成了多事之秋。一九三五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日寇在通县驻有重兵，敌人就在肘腋之下，给驻守在平津附近的二十九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到大街上一走，各个胡同口、电杆上，到处贴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卖白面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租，昼夜还不能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堪。

日寇在北平的驻屯军，经常派人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屙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飞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都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指示要睦邻友好，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日寇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辎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大街上尘土弥漫，杀气腾腾

腾。我亲眼看到，极度愤慨的沿街群众，和飞扬跋扈的日寇官兵，在表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古城，竟容忍邻国的军队在大街上作过境演习，这是国际社会罕见的事例，是中华民族的国耻！

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日寇要搞军事行动，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作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们来自廿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上班以后就议论抗日问题，大家以亲眼目睹的事实表明，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宋哲元的故乡只有卅多华里。廿九军军部里有很多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廿九军军部里去看望同乡，到处都在议论中日冲突和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这路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人，我国的军队有四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许许多多的内战当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打起来都是在中国境内周旋，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军有利。日寇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而且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军队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的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里能有几十个日本鬼子兵？日寇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象八月十五杀鞑子一样，把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一个一个收拾掉。听到他们这些议论，我也觉着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的，廿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付占魁主持。“芦沟桥事变”前，日寇在北平附近闹得很厉害的时候，宋哲元到绥署讲过两次话，他是召集全体干部讲话，我也在场。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还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指南京政府，下同）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日军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就处于危险境地，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又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么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寇这样疯狂，先干掉他们，也许在短时期内会“老实”一些，这种想法也许是片面的、天真的，但是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青年军官是主张积极抗日的。进入六月份以后，日寇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廿九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玩味的是，日寇在哪个地方演习，廿九军就在日寇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作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寇在哪里演习，廿九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的海军部旧址。六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据说，廿九军在捷克购买的武器弹药都还没有到达。绥署及廿九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芦沟桥事变

日寇经常在北平附近闹事，北平成为北方最敏感的地区，一旦北平的安全发生问题，绥靖公署是否存在也值得考虑。绥署人员既关心国事也关心自己的生活，为此，对日寇在北平附近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锐意分析。军务处三科科长韩树栋（字乙范）是我的本家，四科科长杨靖国（字芳洲，乐陵人）是我大哥的挚友，参谋处中校参谋杨学潜（字听鱼，河北盐山人）是我姐夫的胞弟，尽管我当时是一个中尉，可是在他们那里听到不少消息。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的部队要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附近演习，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我军的拒绝。七日我军得到情报，日寇于当天要进行实弹演习，廿九军的卅七师当即作了应战准备（当时卅七师师长是冯治安）。六日夜十一时许宛平县附近有枪声，不久，日本使馆通知我军，说他们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查，当即遭到我驻军的严词拒绝。接着日寇威胁说，如不许搜查，他们要采取军事行动。我方为避免事态扩大，经商定共同派人举行谈判，我方的谈判代表是：河北省四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事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是：绥署顾问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他们于八日晨到达宛平县署，谈判中间，日寇在宛平东西两门外发动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双方发生了激战。接着廿九军军部对守军发布命令说：“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官兵接到命令后，都表示决心，誓死守土，给敢于来犯的敌人以狠狠地打击。

原来驻守在芦沟桥附近的是廿九军卅七师的一一〇旅的一个团，“七七事变”爆发时，又增加了几个团。我军的兵力很雄厚，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日寇始终没有得逞。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揭露日寇的暴行，赞扬廿九军决心抗日，

全国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纷纷到北平游行示威谈话或通电声援廿九军抗日，所有这些行动，都给廿九军的官兵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绥署里，天天问战况、议战事，看到全国各界都在声援廿九军抗日时，感到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中校李植阳（字润亨，河北盐山人后来全家迁密云），少校王德盛（字洁忱，河南周口人），上尉丁仰恒（字希晨，安徽蒙城人），梁尔昌（河北丰润人）和中尉纪剑峰（河北人）都找科长、处长报名，要求调回原部队参加抗日。绥署特务营请来了十几名磨剪子抢刀子的工人为他们磨大刀，除去管饭以外，每一天给一元钱的补贴。磨刀工人听说是磨了刀要杀日本鬼子，他们表示光管饭吃就行，不要补贴。特务营说服他们说，你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把全营的大刀磨的又快又好。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七日夜間，日寇由通县等处向南苑集中，当晚宋哲元下令把廿九军军部移到北平城内。廿八日晨日寇向团河及南苑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以十数架飞机支援他们的坦克、步、骑、炮兵联合作战。通县距南苑只有几十华里，敌机起飞不久即可到达南苑，我军装备差，火力远远不如敌人，再加上没有制空权，战斗一开始我军就落于苦战。驻守在南苑一带的有参谋训练班，军事训练团，手枪旅的一部分，还有刚从河间调来的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等等。总的人数不算少，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重武器又少，官兵们凭着爱国的赤诚和组织性纪律性，手持劣式武器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一时部队里失去指挥中心，官兵们遭到了重大伤亡！

廿八日清晨我们正在绥署宿舍大楼里酣睡，忽然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寇进攻南苑，我南苑守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消息传来，人心振奋，我们盼望已久的抗击日寇的军

事行动终于成为现实。住在集体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年轻人，没家以上的都在市内租有民房，家属走了，房子大半没有退，他们仍然住在家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分头聚拢，议论着战争打起来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多属于绥署刚成立时才参加进来的，没有原来的单位，议论的结果是，如蒙批准了一些同事回原部队的申请，我们就把他们的工作担当起来，至少可以部分担当起来，处里的勤杂工作，我们都可以抢着干，各班的值班，我们可以包下来。我们议论的很热烈，南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密集，拂晓以后，敌机开始肆虐，炸弹爆炸声清晰可闻，我军火力差，预料到我军会有较大的伤亡。但是，廿九军是受气的部队，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气，最近几年又因为蒋介石执行不抵抗主义受日本军队的气，廿九军是哀军，哀军必胜。谈论到这里，我们预料到南苑的官兵，会给来犯的日寇以有力的还击。

廿八日上午，绥署的干部上班特别早，见面后喜笑颜开，都为南苑的抗击日寇欢呼。从早晨开始，大街上响起了鞭炮声，不久，全市大面积响起了鞭炮声，这是北平各界对抗击日寇的表态，也是对廿九军爱国行动的支持。从上午九时开始，北平各公共场所及大街两旁的便道上出现了许多宣传队，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学生们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日寇的各种暴行，周围的听众深受感动。我看到街道上的行人个个喜形于色，精神特别振奋，北平各界迅速组织起抗敌后援会，其中包括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可以说整个北平市都行动起来了。由此使我回忆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参加示威游行的情景：一九三一年夏，我在盐山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入校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参加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上，万人空巷，都站在队伍两旁为学生助威。大街上的所有声音，都为学生们的口号声压倒，队伍内外，彼此会意，心连着心。前一次游行，我是一个爱国学生，这一次战斗，我是

抗日队伍中时躲避一兵。前后门以我在北平市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抗击日这不仅是北平各界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谁以实际行动抗日，谁就受到称颂，谁反对抗日，谁就受到唾弃。

廿八日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到了东四大街上看看市面情况，见到一批批的廿九军队伍向市内撤退。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刚刚坐下来，递烟的、倒茶的、送饼干点心的，一个个接踵而来。感动的官兵们热泪盈眶，有些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即席汇报战斗经过，他们虽然退下来了，群众们却给予安慰和同情。

北平陷落

廿八日夜我为了躲避空袭，宿在朋友杨芳洲家里。廿九日晨我提前到绥署上班，一见大门口没有警卫，我心里一楞，到了办公室，空无一人。不久通讯员朱宝元来到，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廿九军退走啦，咱们不上班啦！”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决定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杨芳洲。刚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参谋长付占魁乘汽车来到，他一见有几名干部往外走，下了汽车用手一甩说：“回去，咱们照常上班”。我转回办公室，梁尔昌等几个同事正在漫谈，不久，通讯员雷风阁送来了报纸，各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到达保定”，附题是“廿九军已撤离北平，阮玄武旅负责维持秩序”。看见了报纸，证实朱宝元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几个人心情沉重，两三分钟以内谁都默不作声。我回到单身宿舍里看了看，有几名勤杂人员带着手拉车正在收拾私人的东西，我见势不好，立即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的东西拉到友人家里。当天下午我又到绥署看了一看，宿舍的东西一抢而光；办公室的家具正在遭到洗劫，整个绥署大院，都已人去楼空。我和刘宗智、王启文、展玉信、苏绍游等住在东四十二条廿

一（？）号，我大哥韩立园从南苑退出来，也住在这里，我叔父（韩月桥字铁岩）在北平行医，后来也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廿九军已经撤退，日寇马上就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半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决心到警察局去求情。到局里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廿九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改交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靖公署八个处一千多人当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处长宋梅村（山东长清人）、作战科长芦风策（保定人，保定军校毕业）和情报科长孙绥先（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可能是陆军大学毕业）三人，其余人员全部留在北平。至于廿九军滞留在北平来不及撤走的更不止此数。更改户口是在廿九军撤走以后，日寇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巨大，北平正在“改朝换代”，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待解决。就在这种时机，把成千上万的廿九军的人员的户口改正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揭发廿九军的人员，导致他们被迫害被杀头。如果不是军民关系好，这两件事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四十七年过去了，原来的警察、原来的房东，一定还有些健在的，可爱的警察和房东们，廿九军感谢你们！

事变前，北平的主要街道上，熙熙攘攘人流不断。日寇一进城，青年妇女及女学生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的又老又丑。日、朝浪人及日本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这些家伙很多不会华语，上车后比比划划，哇里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日寇在市内各区都设有军事据点，他们抓劳力构筑工事，据传说，重要工事完工后，把劳力杀掉灭口。由此我回忆起天津海河的一批批浮尸来，“九

“一八事变”后，日寇在天津大筑工事，海河里几乎天天有浮尸，那些浮尸都是在工事完工后被日寇杀掉的。

日寇侵占北平以后，经常用一些军用汽车在大街上全速行驶，车上装的是全付武装的鬼子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我们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鬼子“会杂技”，掉到地上能全身跳跃，我们才明白车上的鬼子都是橡皮人。又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个弹药箱，箱子摔坏了，里面的子弹全是石头子。从这两个怪事分析，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寇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他们才这样变戏法。由于日寇的军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碰伤人、轧死人的事件不断传出，行人横过马路都视为畏途。在大街上、商店里，有几次看到“中国人日本兵”，他们都是高个子、平后脑勺，在体型上和东洋鬼子有明显的不同。据店员们说，这些“中国人日本兵”多数进店后不吭声，个别的会讲流利的东北话。他们买东西给钱，不发横，不打人，这可能是被迫征调来的，他们没有忘记是中国人。

日寇进城不久，北平出现了一批新贵，江朝宗当了北平市长，绥署经理处副处长郭自新当了晋、冀、察、绥四省统税局局长。据悉经理处的干部除郭子新当汉奸的是极个别的，该处绝大多数干部都陆续逃到后方，参加了抗战。当郭子新粉墨登场的时候，滞留在北平的绥署人员，都骂他是廿九军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罪人。

逃出虎口

住在东四十二条的我们六个年轻人都是学生成份，参加绥靖公署固然是为了谋生，也是因为廿九军抗日我们才自愿加入的，我和苏绍游、刘宗智三人，穿上军装还不到两年就遇到这种挫折，思想上的苦恼难以想象。我们为了抗日想念团体，象被大人丢掉的孩

子思念家长那么迫切，我们困处在北平真是度日如年，为了逃出北平，我们多方找向导，向导找不到，我们想混出城门去寻找部队。熟悉情况的人说，城门门禁森严，对学生对有军人嫌疑的人检查特别仔细，而且北平郊区各要路口上都设了关卡，侥幸过关是很困难的。正在我们焦急的时候，天天传说要检查户口，我们这些假商人，既没有商业知识，又没有哪一个商号承认我们。为了争取店员或学徒的资格，多次计议找关系户。商人们胆小怕事，担心招了我们这几个假店员、假学徒惹来是非，都不愿意担担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寄希望于平津通车。天津有租界、有海口、有亲友和老乡，只要能逃到天津，就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决心抗日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不当汉奸。

八月×日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九时十八分，这是日寇精心安排的。一九三一年日寇在东北搞了一个“九一八”，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九点十八分进站。北平是中国文化古城，日寇占领北平，他们认为这是另一个“九一八”。

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韩立园、刘宗智、展玉信乘车去津。（一九三八年韩、刘到延安抗大学习，尔后加入了共产党）那一次我要走，叔父不同意，一是路费不足，而更重要的是担心我哥两个同时遭到不幸。九月上旬我和苏绍游（乐陵人）、李霄五（乐陵人）、韩树声（我们同村人）四人同车去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式草帽，身着深蓝色抗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所有的小孩都不哭不闹，好象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他们这些长辈们都已不自由了。火车开动以后，日寇开始检查，有两个鬼子持枪站在两个车箱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个是学生，二是已经化装的军人，学生宣传抗日，廿九军打过他们，日寇对这两种人恨之

入骨。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顶和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灰白，面部黑）。接着摸手心，反来复去地摸，摸摸手心上有无老茧，摸了左手摸右手。之后他用双手从我的颈部一直摸到脚后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没有发现问题就检查行李，打开我的被子，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摸回来。检查完毕，一个鬼子说：“买卖、买卖”，我随声附和说：“买卖、买卖”，我这个假店员，如果头部表皮有分界线或者手心上有老茧，那就真麻烦了。不论检查到哪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闷闷不语，却都息息相关。我们车箱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从表情上看，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每放回一人，都觉着如释重负。旅客们虽素不相识，在残暴的敌人恐怖之下，浓郁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到了天津车站，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都站立着两排持枪的日寇，两排相对而立，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尖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长队式的刺刀中间行进，不能惊慌，不允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剩下的三个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去，三人分头到路口上寻找，我们是上午九时许到达天津，到了下午四时终于找到了苏绍游。据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鬼子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韩树声到罐头商店找到我们的同学蔡维光，向他打听廿九军的情况，准备从陆路寻找部队。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调查。据说，廿九军正在沧洲以北作战，日寇从海上运来不少援军，天津郊区又被他们占领，每个路口都设置了盘查哨，老弱妇孺经严格检查后可以放行，青壮年一律不许通过。蔡维

光说，连日暴雨，由陆路逃离天津，既危险又不好走，不如乘轮船去青岛，经济南再转津浦线。我们采纳了维光的建议，决定坐轮船走。下午韩树声、李胥五到太古公司买票，不久他们回来了，说是轮船公司不卖票，怎么说也不行。我们合计了一下，路费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紧时间寻找部队，于是四个人一起到轮船公司。卖票的是两个中国人，都在四十岁左右，一边扇扇子，一边喝茶水，态度非常悠闲。我们要求售票，他们说开船日期未定不能卖票。我们问他啥时候能定？他们让我们明早八点去公司听消息。当时在场的除我们四人以外，还有七八个要求买票的，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我们只好回来。

第二天我们六点多钟就到公司门口排队，前边已经排了六七个人。上班后还是那两位值班，站在前边的人问他们卖票吗？他们说客满了，大家要他拿出登记簿来，他们不拿。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非要他们公开登记簿不可。他们马上改了嘴，说是一个单位包下来了。大家又问，是哪个单位承包的？我们自己去联系，他俩谁也不说，很明显是他们编造的。旅客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他俩很窘，于是又改耍花招，说是优待从北平逃出来的人员，对军人学生实行优待，让这些人先买票。我们四个人立即站到前边去，并说我们是廿九军的，请按优待办法售票。他们说，光说话不行，得拿出证件来。我们说，鬼于检查的那么严格，谁敢带证件呀！他们说，没有证件不能说明身份。我们为了解决船票问题，光对他们说好的，于是把在北平的遭遇，火车上的检查，我们今后的决心，向他们俩如实倾诉，希望得到他俩的同情和支持，赶快给我们解决船票。在旁边买票的人们都感动了，可他俩就是无动于衷，一定要我们拿出证明来才解决。我们立即找蔡维光，请他想办法证明。蔡维光陪同我们到了轮船公司，行前他们单位给蔡开了证明信，证明蔡维光是罐头商店的人。蔡维光说，请卖给他们四张票，这四位都是我们的同乡，出

了问题我负责任。卖票的说，需要请示公司领导人。蔡说，这是正常业务，不需要请示领导。当时等着买票的人都气愤极了，有的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为了一张船票，你们为什么这样枝节横生，刁难自己的同胞？有的说，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欺侮的够受了，凡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你们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借着卖票权，给自己的同胞制造麻烦，这样做对谁有利？大家都理直气壮地向那两个卖票的说理，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被迫卖票。站在先头等着买票的那几位，主动后撤，让给我们四个人先买。从天津买到青岛的船票本来是五元一张，他们说最近涨了价，每张船票十五元。我们这才明白，他们一再变卦，一再要花招，目的就是为了提价。我们拿到船票以后，苏绍游用手指着那两个卖票的大声斥责说，你们两个都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九月十×日我们乘船向青岛进发，统舱里绝大多数是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生和军人。轮船在海河里徐徐前进，两岸上和在海河当中乘舢板游弋的日寇，纷纷向轮船上起哄，鬼子讽刺中国人乘外轮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们，有的怒目横扫，有的大声还击，当时日寇还不敢向外轮开枪，他们也无可奈何。轮船驶入渤海海域，水天一色，一望无际，有的学生议论说，海水是纯洁的，现在日寇的兵船往来穿梭，海水正在遭到侵略者的污染，等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要通通把日寇逐出国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国将会加速建设，展翅雄飞！

轮船进入了山东海域，船上发布消息说，青岛有情况，改到烟台登陆。到了烟台在虎头崖靠岸，当地没有码头，旅客由小船接运。当我们见到国旗在岸上高高飘扬，一个个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和几位同行者同时在小船上起立、脱帽，向国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我们默默向祖国汇报，您的这些赤子们，在沦陷区遭受了一个多月的凌辱与折磨之后，现在又回到了您的怀抱。亲

爱的祖国啊请您放心，您的这些孩子们将重新拿起武器，在今后的日日夜夜里，为您的尊严和荣誉，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

到了烟台，我们在苏绍游的大哥家里住了两天，之后我们各背起一个大包袱徒步西行，经过黄县、招远、掖县到达潍县。农村里表面上是平静的，成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非常关心抗战，每到一地他们问长问短，渴望我们介绍一些平津的情况。在这种时机，我们有意识地把日寇的暴行和沦陷群众的苦难告诉他们，借以提高同胞们的爱国心，坚定他们抗日救国的信念。由于前些时芦沟桥敌我双方的对峙，加上报纸宣传廿九军抗日的事迹，各地群众对廿九军表示赞扬，可以看出，广大群众都是赞成抗日的。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廿九军的军官时，都表示慰问和欢迎。在潍县，我们乘火车去济南，火车上秩序还好，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员一律免票乘车，也都不要证明。实行这一办法，使沦陷区逃出来的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感受到祖国的热爱。火车上还有许多宣传队，绝大多数宣传员是从平津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很会演讲，也都有亲身经历，讲起来有血有肉，感染力很强。

我进入盐山初中的那一年，正值北伐军进抵济南。由于日寇挑衅发生了济南惨案。我们学校里自编自演济南惨案话剧，学生们激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次又因为日寇侵华，迫使我们到了济南，旧恨新仇，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将永无宁日。在济南车站上，我们巧遇到军务处的战友丁郁恒，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热情握手，都想争取用最快的时间最简短的语言，把别后的情况向自己的战友倾诉。在济南深知敌我对峙的第一线就在沧洲以北，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附近，当天我们乘军用车到达泊镇。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中学，此时，廿九军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由宋哲元任总司令。原来属于廿九军的第三十七师、卅八师和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由于连下暴雨，泊镇一带及其以北地区一片汪洋，